

吳稚暉先生淨化自我之歷鍊工夫

湯承業

一、掙脫俗塵、擺脫物欲

臺靜農發覺中國男性「無論其為顯貴或僕隸，都有一種凝重寬厚的氣象」。此種現象，無以為名，姑為論之，則為以平凡為貴，以貧賤為樂。當今之世而達乎此等境界者，則稚老應為典型。如蔣經國於民國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）為之闡述曰：

有的人以榮華富貴為快樂，有的却因榮華富貴更加痛苦。在我覺得印象最深的為吳稚暉老先生，對於世事的一切問題和觀感，看得最為透澈，以他過去的功勳名譽，今日粗食布衣，甘之如飴，悠然自得；他的年齡雖老，仍具奮鬥的革命精神。

此種修養境界，乃久經操持與踐履之所致，蓋以稚老於三十歲「立身」之年，即以「忠孝勤儉」為自立之箴，以「閔達沈毅」為自勉之箴。篤行此箴之具體步驟，則列之為八目。如：

又舉：樂貧賤，務專精，嚴決斷，慎威儀，寡言語，養氣度，絕疑懼，祛私欲等八條目以自勉。

孔子以「貧而樂，富而好禮」為人生歷鍊之目標，稚老則列「樂貧賤」為八目之首而以之為始，則其已歷鍊於儒家之門徑者可知矣。苟能如此，則治學而學必有成，治事而事必有功。蓋唯其人之能夠經由「樂貧賤」之歷鍊而達於「貧而樂」之境界，始能掙脫塵俗，擺脫物欲；以至淨化自我，歸還自我。明乎此義，則自然可以領悟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」之心靈所寄與所在。於此，則必然覺悟：所以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為士矣」！所以

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！雖然人亦為物，身須寄物；惟必以人役物，絕不以物役人。誠如江舉謙述曰：「人不能沒有物質欲望，但物質欲望只是生活手段，而不是目的」。

欲期自我之淨化者，則須居物之上而不居於其中；欲期自我之歸還者，則須處物之外而不處於其內。如此，則身雖未達到「居之安」之水準，而心却必已達到「居之安」之標準。釋言之，生活不必講究水準，心靈務必講求標準。由此可知，「居之安」者，即「心之安」也。安其心而治學，則學必有成，安其心而治事，則事必有功。如蔣經國述曰：

吳老師認為居之安的真義，是要做到心安理得才能夠進入這個境界；無論在生活上，精神上，工作上，都得不慌張，不空虛，更不煩惱。心有所主，志有所向，則自然「不慌張」；心得乎充實，志得乎光大，則自然「不空虛」；心不累於物，志不囿於物，則自然「不煩惱」。終生堅守此三者而積心以奮之，積力以勉之，則必然求學得道而無「俗氣」。俗氣者何也？稚老譬而喻之曰：

無論好事，好極事；壞事，壞極事；樂事，樂極事；苦事，苦極事；恨事，恨極事；愧事，愧極事；羨事，羨極事；願事，願極事；憐事，憐極事；過意不去事，過意不去極事；妬忌事，妬忌極事；沒趣事，沒趣極事；有一動心，作彼無益，害此有益者，終不成人。絕去物論毀譽，方無搖動。

且必然舉事成業而無「官氣」，官氣者何也？稚老諷而摘之曰：

現代做官，確有妙訣。未登仕版之前，必須善于用氣。用之得當，始

能做到大官。蓋氣分數種，曰耐氣、忍氣、下氣、使氣，甚至大發脾氣。同時應當小氣的地方，雖一碗殘羹也要小氣。若須大氣的地方，即使自己是一位微員，也要大氣。切不可應該耐氣忍氣的地方而使氣，下氣的地方而大發脾氣，以及該小氣反而大氣，該大氣反而小氣。如能這樣用氣，就不患不達到氣概十足，頭指氣使的地位；總而言之，謂之「官氣」。

俗氣與官氣之關係，乃為並蒂而同根，兩面而合體；人之易於失落自我與陷溺自我者，即因不知淨心潔身而避此二氣，以致為其所污染、所淹沒；於是得意時則「官氣」畢顯、而「俗氣」亦必附於「官氣」以露之，失意時則「俗氣」畢露、而「官氣」亦必隱於「俗氣」以顯之。何以故而必如此？曰：心累於物與志囿於物也。似稚老者，「抗戰八年，安步當車，晚食當肉，居一角小樓，吃三餐包飯，甘之如飴，安之若素。如非哲人，孰能處此」？

二、「即奇亦平、即平亦奇」

稚老之為人，乃為「不求奇而奇，不求平而平」。因乎此也，所以中外古今之偉人不能與稚老相比，而稚老亦不能與中外古今之人相比。何以故？李石曾之所論，堪稱允當。如：

稚老是一個非常的常人，不平常的平民，這是任何人所不能與他倫比之點，這是他的奇特處，也是他的平易處。平易與奇特參加混合為一，自不能謂為後無來者，而可謂前無古人。中國古時的堯舜周公，西方較近的華盛頓與樊克林，英國之牛頓，法國之巴斯德，各有其登峯造極之處，固然稚老不能與之比量，而此諸多歷史的偉人乃至聖人與稚老亦不能相比，此乃吾之所謂即奇亦平之處，無以名之，而名之曰稚老。稚老聚諸多之不相同合在一處，乃其為人之特徵而出於自然。毫無一毫勉強，亦如其人之不求奇而奇，不求平而平。

稚老之所以成為「即奇亦平」與「即平亦奇」者，乃以其能夠集其大成與其大集；平與奇者固可「混合為一」，同與異者亦可「合在一處」。孟子曰：「伯夷、聖之清者也，伊尹、聖之任者也，柳下惠、聖之和者也，

孔子、聖之時者也」。四聖各具特點，涇渭分明，清者必不任之，和者必不時之；換言之，樂於擔當者（任之），則難保自心之清；勇於開創者（時之），則難能與眾之和。稚老明言「官是一定不必做，國事一定不可不問」。則其既為清者，又為任者。並且，「其平生教人處事，常出之談諧幽默」；即使國父對之，亦「總是肅然起敬，尊之如師」。則其既為和者，又為時者。如此，故其「一生所行所為，多有特出之處，而這些特出之處，正是稚暉先生其所以為稚暉先生的獨到地方，對我們所引起的啓示作用非常之大」。雖然其為「集大成」人物，而大成不掩其「特出」之處；雖然其為「成大集」人物，而大集不蔽其「獨到」之處。既能成大成、而又能出己之所特出；既能集大成、而又能到己之所獨到。此乃稚老出於平凡而超於平凡，故其雖為非非凡而實為非凡。亦乃稚老由乎平常而超乎平常，故其雖為非非常而實為非常。簡而言之；凡之於非凡，此所以為稚老也；常之於非常，此所以為稚老也。

因其能集大成，與相集相成，故為集其大者為大人，成其大者為大人。以其為大人，故能集兩種不同之性能而成為一能，集兩種不同之性格而成為一格；以至既能「動心」，又能「忍性」，人則皆所不能，已則「曾益其所不能」。大人之大性能如此，故能於讀書時而「不忘救國」，救國時而「不忘讀書」；並且倡言曰：「學術所以救國，救國即為政治」。認為人之為全人完人者，應該「通人」而兼「學人」，「學人」而兼「通人」；以「事業」合於「學問」，以「學問」合於「事業」。其救國之理論，則主張：「有進步、必俟革命後，謀進步，應在革命先」。其救國之行動，則主張：「一方面任由社會自動進行，一方面以革命排除障礙自由物」。崇名教、講維新，而不可存有「名士氣」，愛國家、講傳統，而不可存有「中國氣」。所以其既諷嚴幾道，又刺梁啟超。如曰：

有老或病之交侵，無可振作，不能施助力於革命者，勿失志而為助紂之虐，附和立憲等等；用其暮氣，轉灰他人之壯心。故有如嚴幾道者，雖其懶放稍過，然彼固絕未肯出而附和一闕無知之立憲。彼用其名士氣，以為中國人者，皆禽獸耳！豈足與言。縱此言出於中國氣十足之嚴幾道，未免自忘其本來。然未嘗不可使梁啟超之徒，稍自愧其鄙

背也。

明乎此義，則知稚老所以原為「公民」而樂以「公民」自居，且主張永保「公民」之榮銜；雖為「元勳」而不以「元勳」自居，且主張永除「元勳」之特權。即對國父，則既不贊之為「英雄」，亦不贊之為「書生」；唯其為「不能形容的偉大」，所以「稱為自然偉大」。此種偉大，即為集其大成者也，即為成其大集者也。

三、寓樂於苦，寓苦於樂

稚老之大性能，乃融兩種性能而成者，其大性格，乃合兩種性格而成者。因有大性能，故能「以出世之高風，為入世之偉業」。因有大性格，故能「身在山林，心存廟堂」。雖然平生不願為偉人，只願為庸人；惟其思想體系，既為「平民的」，又為「科學的」；故能「在平凡中做出不平凡的事情」。即其本人亦自承認言行雖屬「狂放」。但其謀國之誠實却至為「平易」。如此之人，故能「永遠放懷於利鎖名羅之外，置身於民胞物與之中」。由此而論之，則知稚老乃是「極平凡而又極不平凡的人物」。如張文伯述曰：

他出身科舉，而學貫中西；身如閒雲野鶴，而繫黨國安危。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。遇事洞燭機先，當仁不讓。決疑解紛，談言微中。誅奸討逆，大義凜然。振一代風氣，作中流砥柱。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。

至其足為「百世師」與「天下法」之許多「不平凡」事蹟，則又舉不勝舉與書不勝書，概括言之，例如薛人仰述曰：

他倡導科學思想，竭力推行國語運動，在學術、思想、教育方面之貢獻，使我們後代深受惠澤。

中國文化之特質，即為「悠遠則博厚，協厚則高明」。孕育於此種文化中之中國人物，自必具有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」之胸懷。稚老涵泳於中國文化極為深久，尤其「南菁書院對他畢生學術修養的影響是極大的」。故其自然能將融會之「大性能」而化為「全性能」，自然能將合備之「大性能」而冶為「全性格」。惟其為「全性能」，故其一能

可發兩項運作，惟其為「全性格」，故其一格可形兩種儀象。如王雲五述曰：

他的為人，在簡樸平凡中現出嚴謹，在淡泊寧靜中熱心教育，在幽默風趣中具有高雅。相信每一位和他交往接觸過的人，他這種別具一格的風範，都留有深刻而生動的印象；因此，無論在他生前或故後，當可聽到一些有關他的談論與推崇。

凡此雙重運作與兩面儀象，皆在平凡中所完成所形成。可知「愈是平凡的，愈有價值，愈不易做到」。進而言之，此一性能與性格表現於稚老之生活方面者，則為寓樂於苦，寓苦於樂；故能不以苦為苦，不以樂為樂；可謂「在至樂與至苦兩方面都達到更為高濶深致的程度」。所以，「他安於尋常，結果又可以說是很不尋常」。

四、自我充實、自我美化

綜上以觀，則知稚老之「平凡處，在其生活方面」；而其「不平凡處，在其革命節操、政治擔當，以及學術思想的博大精深」。蓋以「古之任天下者莫過伊尹」，故其認為「學者必當有天下己任之思」。明乎此，則知稚老所以謂曰：「平生志願，本不欲為文人學士」。亦所以力求「稍知經術之大者，熟究史事之要者」。於是力求自我充實，力求自我美化；以至能「大」能「化」，終至發「光」發「輝」。夫如此，乃得成其「自然偉大」。如載：

無論其為平凡或不平凡處，都足顯現他的獨特風格，成其自然偉大，光耀羣倫。他來也光明，去也光明，俯仰無忤地過了光輝的一生。此種「自然偉大」者，固指其「人格偉大」而言；尤因其「人格偉大」所形成之「局面偉大」也。如載：

他的局面偉大，就與眾不同了。概括的說，對於古今中外的學術是無所不通，對於名位利祿却無一不介，所以能夠論道經邦四五十年，却没有做一天官吏。

此一「局面偉大」之涵義，乃指駕馭苦樂與消解貧富之大性能大性格而言者，而其偉大之「局面」之中，乃包括「學問、品行、氣概」三大要素。

如稚老曰：

大丈夫在世，惟有學問，有品行，有氣概為貴；窮而衣服陋，無妨也。

其所以能夠「沒有做一天官吏」而可「論道經邦四五十年」者，乃因自謙自警其「行不足觀，學不足述」，故而「益覺當做之學問甚多」。尤其特能以「躲起」之工夫，而為「整理 總理遺著」而「終日忙碌」。此為「充實」之歷程，亦為「光輝」之歷鍊也。

稚老之所以有此「偉大局面」者，以其特能建造自我與超越自我也。

而其建造之門徑與超越之路途者。則在「胸懷耿介，無畏無懼；視功名如敝屣，等富貴若浮雲」。人而竟有如此之「偉大局面」，誠足稱為「曠代奇人」。如載：

稚老一生，不慕榮利，淡泊自甘，堅決不肯擔任政府中任何實際職務

；祇願留在黨的組織中提供意見，顧問國事，發人心之所未發，言人口之所不言。一生過的是高人雅士的寒素生活，實際且擔任着「出則

負天下望，入則為帝王師」的重任，真是曠代奇人。

稚老所以能夠守其所當守，為其所當為，且能終生不易其守，終生不妄其為者；蓋以其「有意志、有決心，有立場」也。其本人固然堅決自絕仕路，並且誓言：「向來不敢無事出入公門」。惟其樂於推荐士人之精明與清明者，進身公門；例如石瑛「由教育界捲入政治漩渦，則係由於稚老的敦促」。石瑛固與稚老為「摯友」，而其亦以「高風亮節」著聞於士林之間也。

石遺室詩話

著者 陳 衍

定價 三一五元

鄭蘇堪（孝胥）嘗言：作詩工處，往往有在悵惘不甘者。因舉王荊公「別浦隨花去，迴舟路已迷，暗香無覓處，日落畫橋西。」二十字，為與神宗遇合不終，感寓之作。本書作者論謂，貴人之不能詩者，無論已；其能詩而最有山林氣者，莫如荊公，遇亦隨之，非居金陵後始然也。

本書作者陳衍，清末鴻儒，梁啟超編庸言雜誌，曾助臂詩話一欄，風評絕佳。平居時與鄭孝胥、易順鼎、曾廣鈞、陳三立等唱和，皆清末民國詩壇俊傑，且今之文學史，多引入篇章，一般讀者亦不陌生。

全書都三十二卷，集梁任公庸言雜誌十三卷，東方雜誌五卷，復合刪改舊稿，益以後之所得，仿鍾嶸詩品例，成此詩話。凡我大學國文系學子，援為參考，獲益自多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